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十大经济学家

〔美〕熊彼特著

宁嘉风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从馬克思到凱恩斯 十大經濟學家

〔美〕熊彼特著

宁嘉风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館

1965年·北京

Joseph A. Schumpeter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52

內 部 讀 物

从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

(美) 熊彼特著 宁嘉風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黃城根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街口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4017·107

1965年2月初版

開本850×1168¹/₃₂

196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218千字

印張9 12/16

印數1—4,000冊

定價(9) 1.20元

譯 者 序 言

熊彼特(1883—1950)是当代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資本主義制度最熱心的辯護士。

他早年執教於奧國維也納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為了支撐垂危的奧國反動政權，曾直接參加統治集團，一度出任奧國財政部部長及銀行總經理。1927年到德國波恩大學擔任教授，1932年又投靠美國，在哈佛大學擔任教授，一直到他逝世前几年。

他為宣揚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寫過不少著作，主要的有《理論經濟學的本質與內容》(1908年)、《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經濟理論與方法史上的階段》(1924年)、《商業循環》(1939年)、《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經濟分析史》和本書(最後兩本書是在他死的那年由他的親友整理出版的)。在這些著作中，熊彼特在“純粹經濟學”、“純粹理論分析”等詞句的偽裝下，竭力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在這本書里，熊彼特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伟大導師馬克思極盡誹謗和歪曲之能事。由於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熱烈擁護馬克思主義，熊彼特表面上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緊接着他就攻擊馬克思的許多基本原理。他說勞動價值理論只適用於完全競爭的情況，並須以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且都屬於同一類型為條件，實際上是誣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同資本主義生產交換過程不相符合。他還說什麼工人不是按照成本計算生產出來的，勞動價值論即使適用於其他一切商品，也永遠不能適用於勞動力這一商品，妄圖借此否定剩餘價值的來源和本

质，从而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他说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他参加生产的功能来合理地参加分配的，如果把“所有权”看做是划分阶级的标准，其合理程度就像把持枪的人界说为士兵一样；即使把社会集团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普通情况下这两个阶级的关系主要是互相合作的关系，趋于较高工资的动向决不亚于趋于较高利润的倾向。显然，他的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妄图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对抗关系，否定马克思所揭明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为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他极力诋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什么马克思关于手工作坊产生封建社会，蒸汽工厂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提法是把技术因素的作用夸大到了危险的程度，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是“阴谋”。他睁眼不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与壮大的事实，胡说什么社会主义“不死鸟”不一定从资本主义覆灭的灰烬中生长出来。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一极是资本家所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的贫困和愚昧的积累。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二十世纪的历史和现状，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前途的科学预见。熊彼特故意颠倒是非黑白，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枉费心机的。

对于书中提到的代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各个流派的十二个

GDC/8/03

學者，熊彼特完全換了一付腔調，一味地吹捧、標榜。他把瓦爾拉說成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說什麼瓦爾拉在經濟學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採用了所謂“經濟數量之間互相依存的純粹邏輯”。他把門格爾的“成就”和哥白尼的成就相比擬，說什麼門格爾的價值理論是唯一能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相抗衡的理論。他宣揚馬歇爾和陶西格的局部均衡分析是有用的工具。他對帕累托、龐巴維克和費希爾更是大加捧場，說什麼帕累托的“成就”超過瓦爾拉；龐巴維克的“造詣”比門格爾更卓越，其理論貢獻屬於全人類；費希爾解決了邊際效用的計量問題，並且在龐巴維克的“成就”的基礎上發展了利息理論。為了在資產階級統治集團面前爭寵，熊彼特對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有所指責（當然是屬於資產階級理論與內部的爭吵），但他還是從根本上加以肯定並為之辯解，他說：故意的批評，即使是個別的假定或主張的抨擊上成功了，仍然無損於凱恩斯學說的整個結構。

人們清楚地知道，上述各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所謂理論與方法，完全是反科學的。他們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出發，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的外表聯繫內兜圈子，而根本抹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內在的本質的聯繫。例如，他們的各種各樣“均衡分析”完全離開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历史的、客觀的過程，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和階級對抗關係。他們把供求關係看成是支配資本主義經濟變動的基本力量，這顯然是錯誤的，僅僅停留於供求關係的分析，並不能究明反映資本主義經濟內在聯繫的客觀規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很明白，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的內在法則，不能由需要與供給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因為要在需要與供給停止發生作用，即互相一致的時候，此等法則方才純粹地實現出來。”（《資本論》第三卷）。他們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是為了反對馬克思

的劳动价值論而捏造出来的一种謬論。它閹割价值范疇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根本否认商品价值反映人和人的生产关系，把商品价值看成“財貨与人們欲望”之間的关系，把价值規律視為人的心理作用的結果。总之，这批庸俗經濟学家不过是“把資產階級生产代表人物关于他們的最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負的看法系統化，賦以学术气味，并宣布为永恒的真理”(馬克思語)吧了。

熊彼特是欧美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1930 年在美国成立的经济計量学会的創始人之一。在这本书里，他自然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吹嘘經濟計量学。他說，瓦尔拉在第一部作品中就提出了可以应用数学来研究經濟問題的意見；馬歇尔的“方便的工具”是經濟計量学的必然的出发点；帕累托描述收入分配的公式对經濟計量学有很大貢獻。如此等等。但是，我們知道，經濟計量学只是披着数学和数理統計的科学外衣来玩弄形式主义的經濟結構，借以否定表明社会經濟現象本质联系的客观規律，繼續販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并为垄断資本集团和資產階級政府維持反动統治出謀獻策。因此，它同其他的一切庸俗經濟理論一样，随着資本主义危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可耻的破产。

鉴于熊彼特的經濟理論和本书中宣揚的各派庸俗經濟学家的理論观点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将本书譯出，供学术界研究和批判之用。

目 录

前言 (伊丽莎伯·布迪·熊彼特)	1
1. 卡尔·馬克思 (1818—1883)	9
2. 馬力·爱斯普利·里昂·瓦尔拉 (1834—1910)	77
3. 卡尔·門格尔 (1840—1921)	83
4. 艾尔弗雷德·馬歇尔 (1842—1924)	93
5. 維尔弗来多·帕累托 (1848—1923)	112
6. 欧根·方·龐巴維克 (1851—1914)	144
7.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 (1859—1940)	190
8. 欧文·費希尔 (1867—1947)	220
9. 韦斯利·克莱尔·密契尔 (1874—1948)	236
10.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1883—1946)	256
附录	287
乔治·弗雷德里克·克納普 (1842—1926)	287
弗雷德里克·方·維塞尔 (1851—1926)	289
拉地斯劳斯·方·鮑尔特凱維茲 (1868—1931)	293
人名对照表	297

前 言

这些篇論文是在 1910 年到 1950 年这四十年期間里写出的，最早的三篇(瓦尔拉、龐巴維克、門格尔)是用德文写的，其余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馬克思的那篇論文以外，它們或是在某一經濟学家逝世的时候，或是在举行某种紀念日的时候——如馬歇尔《经济学原理》发表五十周年紀念，帕累托誕辰一百周年紀念——为几个經濟杂志写的。熊彼特认为它們是为特定的紀念日仓促赶写成的，沒有集刊成书的价值。但是許多人需要它們，因为原来发表它們的那些杂志难于得到。所以，他在逝世(1950 年 1 月)前几个月，最后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

这十篇主要論文，除了关于馬克思的那一篇以外，都是熊彼特自己选择的。1949 年 6 月，即《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一百周年以后不久，为了紀念这篇名著，他給《政治經濟学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經濟学中》的論文。他原先打算把这篇論文选入本书。現在我們用《資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即《馬克思學說》代替了它，因为这篇文章对于作为先知、社会学家、經濟学家和导师的馬克思，作了更全面的論述。我非常感謝卡斯·坎斐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慷慨允許將《馬克思學說》选入《十大經濟学家》里。我同时借此机会感謝《經濟学季刊》、《美国經濟評論》、《經濟学杂志》和《計量經濟学》的編輯和出版者，因为他們同意把原先在他們刊物上发表过的这些論文选入本书。本书所选入的部分論文原先发表在早期德文《国民經濟杂志》上，現在这一刊物已經停刊，我就无从感謝了。

附录中关于克納普、維塞尔和鮑尔特凱維茲的三篇短文，是由于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議而被选入的。他认为这三篇短文应当再发表，并且应当和其他传记論文一道选入本书。这三篇短文是为《經濟学杂志》写的。从1920年到1926年熊彼特是这一杂志的奥国通訊編輯，从1927年到1932年又是該杂志的德国通訊編輯，1932年是他离开波恩大学到哈佛去的时候。

著者和这些篇传记論文的主人翁之間具有密切的联系。他不仅推崇他們的作品，而且，除了一个例外，他都認識他們，^①并且同其中一些人的私人友誼很亲密。这一例外又是卡尔·馬克思。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和十大經濟学家中最年輕的凱恩斯誕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論》里，熊彼特企图提出“关于經濟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經濟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純粹經濟理論”。在这一著作日文版的緒言里，他說：“讀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馬克思經濟学說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实际上，馬克思所以有别于同时代和前代的經濟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經濟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經濟学的概念和命題；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創見。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們可能发现他有許多可以批評之处。”此外，在《經濟分析史》手稿里我們看到：“在他〔馬克思〕的主导思想里，经济发展一事不像

^① 这句话对于十篇主要論文所論述的人物全部适用，至于附录中所論述的三位經濟学家，他和維塞尔很熟悉，他也可能見过克納普和鮑尔特凱維茲。

当时一切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經濟静态学的附属物，而是中心問題。他把他的分析力集中于闡明由于自身內在的邏輯而变动的經濟过程，如何不断地改变社会体制——实际上即整个社会。”这种看法是他們共有的，但却引向极不相同的結果：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資本主义的热心辯护人。

熊彼特认为，作为一門科学的經濟学，它的发展决定于看法与技术。正如他推崇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想法那样，他也推崇只見過一次面的瓦尔拉的純粹經濟理論。在《經濟分析史》里关于后者他說：“……經濟学是一辆龐大的公共汽車，它运载着兴趣和难以互相比較的許多乘客。但是就純粹理論來說，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經濟学家。他的經濟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創造性的优点和古典学派的綜合的优点統一起来，这是唯一可与理論物理学的成就比美的一个經濟学家的作品。”

馬克思和瓦尔拉各走一个极端：前者企图合理地說明經濟变迁；后者給我們一个“理論工具，它在經濟学的历史中第一次有效地采用了經濟数量之間互相依賴的純粹邏輯。”

熊彼特对于历史和純粹理論，計量經濟学和大量搜集的实际資料，社会学和統計学，都极为欣賞，并认为有用。这是他的特色。^①这种广泛兴趣也反映在这些篇傳記論文之中。

他在維也納求学的时候認識了門格尔、龐巴維克和維塞尔。門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龐巴維克与維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或維也納學派的共同創始人。那时門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只見過他一两次。但这些篇論文的著者是維塞尔和龐巴維克的討論班上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其后，关于利息率問題他

^① 哈伯勒在《經濟學季刊》（1950年8月）里提到他說，在个别領域里有人超过他。“但作为經濟學各部門的大師和博學多能之士，當代經濟學家無出熊彼特之右者。”

和龐巴維克進行了著名的論戰（見《國民經濟雜誌》，1913年）。1921年慶祝維塞爾七十誕辰時，他是三位發言人之一。

雖然他對於自己受熏陶的奧地利學派的著作看得很高，他對於發展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另一個學派卻更有興趣，那就是由於瓦爾拉著作而產生出來的洛桑學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學派的真正創始人是接替瓦爾拉在洛桑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的他傑出學生帕累托。直到最近，對於英美的經濟學家來說，他們的作品是太“數學化”和“理論化”了。同時英美的經濟學家認為閱讀用其他文字寫的經濟學家的著作有困難（也許是浪費時間）。但是洛桑學派在早年就得到兩位第一流的美國信徒，歐文·費希爾和H. L. 穆爾。本書的十篇論文中有三篇是獻給瓦爾拉、帕累托和費希爾的。在關於帕累托的論文的一個腳注里，熊彼特描述了一次集會，會上談論着各派經濟學家，帕累托對於歐文·費希爾給予很高的評價；熊彼特說，“當我聽到他〔帕累托〕對於〔費希爾的〕《資本與收入》給予很高的評價時，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1906年在維也納獲得學位以後，熊彼特到英國去了幾個月。他拜訪了一些英國經濟學家，在1907年他第一次會見了馬歇爾。熊彼特在1933年12月給《經濟學雜誌》寫了一篇凱恩斯《傳記論文集》的書評，在一個附注里簡短地描述了這次會見。在評論凱恩斯關於馬歇爾的論文時，他寫道：“當我在1907年隔着早餐桌望着他〔馬歇爾〕時，我對他說：‘教授，在我們談話之後，（關於我的科研計劃）我真覺得我就像一個輕率的戀愛者一心要进行冒險的結婚，而你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伯想說服我斷了這個念頭。’他回答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要是可為的話，伯父的勸戒就無用了’。”本書里熊彼特自己的論文表明他對馬歇爾的著作是如何地重視。當這篇論文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之後，他收到瑪麗·馬歇爾在

1941年7月19日从英国剑桥寄来的一封短信。信里說：“我刚刚收到《美国經濟評論》。我正以极大的兴趣閱讀你所写的关于馬歇尔《經濟学原理》发表五十周年的評價。我一向就知道你对于他的著作是如何贊賞。我很高兴你趁此良机热烈而恰当地表达了你的贊賞。这篇論文的最末一段尤其使我欣慰。我也和你同样欣賞凱恩斯先生的《紀念艾尔弗雷德·馬歇尔》一文。”

熊彼特在1913—1914这一学年作为奥国交換教授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可能是第一次和这些篇論文中所討論到的美国经济学家(陶西格、費希尔、密契尔)会面。在此之前，他閱讀过他們的著作，并至少和陶西格通过信。1912年11月27日陶西格从馬薩諸塞州劍桥写給他一封信，信中稱贊这位青年經濟学家的英文。并討論了他所提出的一个理論問題。“我对于你的論证沒有爭議，但是我的傾向是从一个更为实际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問題。”陶西格在提出供給图表的一些画法以后又繼續說：“我很想把同样論证应用于劳动，就像应用于資本与土地一样，并发展一种‘租賃’劳动理論。我已經拟出来討論这一題目的一篇长文的大綱。你当然知道我的朋友J. B. 克拉克进行这种論证，以及稍晚一些时候欧文·費希尔更仔細地进行这种論证的情形。关于这一論题还没有得到最后結論。我并不如此放肆地认为我自己能够得出这一結論，但是我希望对这一題目有所貢獻。”这样开始的友誼一直繼續到1940年陶西格逝世的时候。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最初几年(1932—1937年)，他和陶西格一起住在斯考特街二号。

同样，他既推崇欧文·費希尔和韦斯利·密契尔，也和他們有感情。他和費希尔共同創立計量經濟学会。当熊彼特到費希尔在紐黑文的比較朴素的家庭(那里烟、酒、咖啡，并且我相信連肉都罕見)訪問时，这两个朋友間饒有許多趣事，咖啡是为这位“墮落的”

客人特別煮的。阿尔及尔大学 G. H. 布斯克教授在法文《政治經濟学評論》1950 年第 3 期的一篇文章里曾經描述过这次紐黑文的周末談話。本书里紀念韦斯利·密契尔逝世的論文，是在熊彼特自己逝世前一两个星期才完成的。密契尔和熊彼特都研究商业循环。他們都相信，为了有效地研究資本主义发展中这一現象，需要調查分析最广泛的实际資料。熊彼特辛勤地搜集他自己的資料，而且几乎沒有別人帮助搜集，因为这是他的工作方法。但他对于能够組織全国經濟研究局，并明智而有效地应用它的資料的人給予最大的贊賞。

虽然凱恩斯很久以来就是《經濟学杂志》的編輯之一，而熊彼特从 1920 年起就是这一杂志的奥国通訊編輯，但是到 1927 年他才和凱恩斯会面。由于一些难以解释的理由，他們两位的关系，不論从个人說或从专业說，都是不太密切的。

关于論述瓦尔拉、門格尔和龐巴維克的那三篇文章的翻譯，曾經发生了一定的困难。正如保罗·斯維济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階級》的緒言里所指出的，也正如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經濟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論文里所指出的，熊彼特的德文风格特別难以翻譯。哈伯勒說，“他的有些复杂的文学笔調，也許可以最好地形容为‘奇异的格式’。这种笔調能恰当地表达出他的思想的复杂結構。它的特征是长长的句子，許多修飾短句，修飾語再加修飾語，詭辯式的詞意区别。正如人們会想到的，他的文体特点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別显著，因为德国語言更便于表现出复杂的結構。”熊彼特也知道这一事实，特別是关于龐巴維克的那篇論文，他认为那篇論文太长了，为了便利英語讀者起見，必須削減和改写。他強調指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关于龐巴維克的那篇論文，比原来的篇幅約削減了一半。削

減工作是由哈伯勒和譯者——著者從前的學生赫伯特·查森浩斯教授——共同進行的。為了他們的關懷和慷慨的幫助，我願意在這裡感謝哈伯勒教授和三位譯者（沃尔夫根·斯托尔培尔、汉斯·辛格和赫伯特·查森浩斯）。我也感謝保羅·斯維濟，他和我一道讀過全部譯文，還在許多地方幫助我潤色文字和澄清含義。在一些情況下，對於譯文中直譯或含義模糊的段落，我不得不冒昧地加以改動。關於龐巴維克的那篇論文特別是如此。因此，譯文中的任何缺點都是我所造成的，從而只能由我來負責。

其餘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這次是按照原來發表的文章重新刊印的。除了改正一些小的印刷錯誤，以及為保證技術細節諸如大寫字母、標點符號和附注排列的格式一致而作了一些小的變動以外，沒有作任何其他改動或修訂。

伊麗莎伯·布迪·熊彼特，

康奈提克，大康尼，

1951年2月2日



卡尔·馬克思

1818—1883

馬克思學說*

絕大部分人类智慧或想像的作品，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后就永远过时了。这一時間，短的仅如茶余飯后的片刻，长的也不过二三十年。但有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們有时会黯然失色，但是它們会以各自的形式，帶着人們能以目睹手触的各自的痕迹，作为文化遗产中可以辨識的成分而恢复其光輝。这些作品我們可以恰当地称为伟大的作品——这一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利之处。按照这种意义說，伟大一詞毫無疑問是适用于馬克思的启示的。但是，用复活來說明伟大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因此可以不受我們愛憎的影响。我們不必以为伟大的成就，不論在基本宗旨方面或在細節方面，必然是光明的来源或沒有錯誤。与此相反，我們可以相信它是黑暗的力量；我們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錯誤的，也可以在若干具体問題上不同意它。对馬克思理論來說，正是由于那些非难或甚至完全否定沒能給它以致命的打击，从而只能有助于它的力量的發揮。

近二十年来，人們看到了极饒兴趣的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苏联享有声誉是不奇怪的。只是在經典化的过程中，馬克思启示的原意和布尔什維克的实践与观念

* 选自約瑟夫·A. 熊彼特：《資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年版，經哈培尔兄弟出版公司允許重印。